

国际政治的 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EXANDER WENDT

[美] 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际政治的 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EXANDER WENDT

[美] 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温特(Wendt, A.)著;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BN 978-7-208-07547-4

I. 国… II. ①温…②秦… III. 国际政治-政治
社会学-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671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范蔚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新一版)

[美]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75 插页 4 字数 404,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7547-4/D·1304

定价 45.00 元

译者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到多种理论竞相争鸣的转化,期间呈现出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时期的一些特征。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主流理论范畴内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辩论被普遍视为“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的重心和焦点。同时,非主流学派也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发起挑战,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和实质内容都提出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质疑。冷战的结束更是给这种多元竞争增加了活力。社会建构主义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其主要理论家和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亚历山大·温特。

一、亚历山大·温特与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兴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成型并受到学术界重视,90年代中后期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温特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1987)、《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992)以及他的理论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分别代表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另外,克拉托奇维尔(Freidrich

Kratochwil)的《规则、规范和决策》、奥努弗(Nicholas Onuf)的《我们造就的世界》、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等都是建构主义的重要著作。¹在建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的理论学者是亚历山大·温特,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全面提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温特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Macalester 学院完成本科学业,主修政治学、辅修哲学,并对国际关系学和哲学的联系深感兴趣。他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并以这一理论为基本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他于1982年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政治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19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1989—1997)、达特茅斯学院(1997—1999),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温特引起国际关系学界注意的是他1987年博士研究生时期在国际关系学重要杂志《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发表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这篇论文提出了施动者和结构互相建构的基本论断,为从社会互动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做了铺垫,开始系统地提出国际政治社会特性的具体研究问题,也为温特本人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1992年,温特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又发表题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致认可并作为研究起点的核心概念——无政府状态——提出了质疑,强调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建构特征,否定了国际社会存在单一无政府逻辑的假说。这篇论文的题目点明社会建构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开始引发学理辩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流建构主义学派的正式宣言。因此,这篇论文成为9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²对于温特本人来说,这篇论文不但奠定了这位年轻学者作为国际关系社会建构学派领袖人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符号互动理论对他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1994年,温特在美国政治学最权威的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集体身份形成和国际性国家》(“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进一步阐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也使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理论进一步趋于成熟。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一部全面提出和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作者自己说,这部著作的最初构思是1987年《国际组织》发表的论文,原型是他1989年的博士论文,1992年论文则是撰写这部著作的关键环节。³1993年温特正式开始写这部著作,经过6年的思考与创作,该书于199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列入该社学理色彩极其厚重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出版。当然,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问世之前,已经出现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框架的著作,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⁴但是,这些著作主要是经验层面的研究,没有对建构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论阐述。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里,温特借鉴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温特尤其重视建立理论体系,所以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建构,尤其强调了国家施动性、无政府文化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如果说温特1992年的论文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的话,这部著作的出版则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体系上趋于成熟。这部还在手稿阶段就已经被广泛引用的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和极大反响,主流学派反应强烈,温特本人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地位和学理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温特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他的学问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在这个学校的政治学系,有一批重视社会理论研究,质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他们认真思考、互相切磋,推动了社会建构学派的发展,启发了温特本人的学术思维。温特在谢辞中所说“明尼苏达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实际上就是指这些80年代末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的年轻学者,包括迈克·巴尼特(Michael Barnett)、贾塔·韦尔兹(Jutta Weldes)、马克·拉菲(Mark Laffey)和希马迪普·穆皮蒂(Himadeep Muppidi)等人。他们都是明尼苏达政治学教授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的学生,也受到这位主要是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教授的影响。

明尼苏达学派的年轻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满足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建构主义”,即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进而,他们年轻,学术思想活跃,较少受权威理论的约束,敢于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新知识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来。其中,温特的同级同学巴尼特的《制度、角色和无序状态》(“*Institutions, Roles, and Disorder*”)、《主权、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体系中的区域秩序》(“*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韦尔兹的《建构国家利益》(“*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不安全的文化:国家、共同体和危险的造就》(*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等已经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建构主义能够成为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明尼苏达学派的年轻学者齐心协力、不惟权威、执著认真、相互启迪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温特之所以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也得益于这个活跃的学术群体。

当然,建构主义兴起更重要的还是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大环境的影响,这个大环境的主要标志是80年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和论战,它构成了温特学术思想发展的学理背景。

二、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国际关系的学理论战

20世纪初,国际关系开始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此后,政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两大派别交替主导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这两个学派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理论争论的主要对手。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⁵

两次大战期间,自由主义以政治理想主义的形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思想明显反映出当时自由主义的主要形式——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影响。E. H. 卡尔 1939 年的经典著作《20 年危机,1919—1939》对理想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现实主义重新兴起。汉斯·摩根索 1948 年的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提出了一个以人性、利益和权力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战后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的奠基之作。之后,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 20 余年,虽然批判声不断,但始终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与之抗衡,也没有一个流派能够动摇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南战争结束、石油危机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现实主义的假定受到质疑。自由主义思潮再起,且声势浩大。1977 年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国际政治》一书问世,反驳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说、军事权力说等基本假说,成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代表作。到 80 年代,多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派别——共和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逐渐成型,虽然这些派别各有侧重,但都可以统一在自由主义框架之中,共同形成了对现实主义的严峻挑战。⁶

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之中,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逐渐成熟,标志是 1979 年问世的肯尼斯·华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在该书中,华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用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秩序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因此,华尔兹理论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华尔兹理论的影响之大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少有的现象。它提出了一整套严谨的研究议程,据此产生了一系列可证伪假设,对 80 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制定了核心研究议程。根据波普尔关于科学始自真问题这一论断,结构现实主义的真正意义也许是激发了更多政治科学家的课题,并引发了近 20 年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理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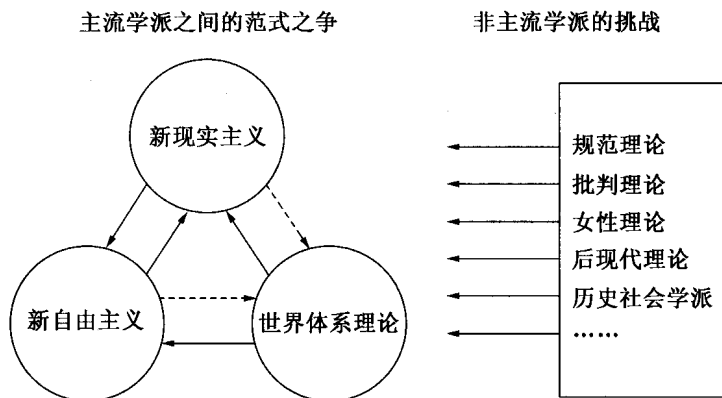
在这场辩论中产生了两个与新现实主义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在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学理方面最有影响、研究议程最严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属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畴。这一派的代表著作是基欧汉1984年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基本相同,但基欧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不能够对国家的许多行为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体系进程也会产生重要的因果意义。体系进程的最重要标志是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的国际制度。这样,基欧汉的主要研究议程就集中在国际制度这个概念上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因此得名。⁷

另一派是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代表人物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只有把世界政治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框架之中才能使其实质和内容得以揭示。国家体系的产生和延续是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的,核心、半核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虽然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特征,但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与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基本的相通,所以也可以置于主流理论范畴的边缘。⁸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之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所以基欧汉将这些理论统称为理性主义理论(Rationalistic theories)。⁹与主流理论范式之间辩论同时发展起来的是所谓的非主流国际关系学派。这个范畴内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可以列入这一范畴的理论流派包括:强调所有理论都具有规范内涵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以女性身份和地位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质询权力的意义、根源和目的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探讨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各种行为体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强调话语作用、探讨权力—知识关系的后现代主义理论(Post-modernism)等。这些理论在涉及理论建设和知识建构等根本问题上与主流理论相左,它们否认理性的核心作用,反思主流

理论作为给定因素的概念,所以被基欧汉统称为反思主义理论(Reflexive theories)。

在90年代初社会建构主义成为学理辩论中的重要派别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下图所示:



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之争中,重心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辩论,这一所谓的新一新之争(neo-neo debate)成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核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上大多数文章是关于这两种理论流派的争论和依照各自理论体系所作的实证分析。¹⁰世界体系理论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两个主流理论派别的应战兴趣不大,所以,这方面的辩论更多是单向的。正因为如此,世界体系理论无法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具有同样重量级的理论范式,虽然被大多数学者纳入主流范式之争范畴,但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非主流理论派别的状况更是如此。非主流理论主要是在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尤其针对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非主流理论的主要贡献也是对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问题——知识建构——提出的质疑。虽然非主流的矛头所向是主流理论,并且主流理论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但主流派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¹¹因此不予重视,对非主流提出的批判也很少作出回应。因此,所谓的第三次大辩论实际上是不对称的论战。

这种现象无疑导致了一种结果,即主流和非主流理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但根本谈不上平等的沟通和交流。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甚多,与之真正对话的只有新自由主义一家。这种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中心的“话语霸权”使得波普尔强调的那种作为科学实质的批判和猜想无法发挥作用,也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结果是可以展开对话和辩论的两种主流国际关系流派——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呈现趋同状况,两派之间的辩论也就越来越失去学问的意义。

主流学派的辩论:由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

7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论辩论的重心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这一论战之所以被称为范式间辩论,是因为现实主义和各自由主义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似乎非常明显。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受到根本质疑:基欧汉和奈1977年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认为国家不是惟一的国际行为体、国家不是单一性理性行为体、军事手段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效用越来越低。¹²其中核心的驳论就是否定国家是单一性的、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假定。其他自由主义学派也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提出质疑。¹³

范式间明显的不可通约性是库恩范式间论战的基本标志,第三次辩论初期的论战表现出这一特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各自观察不同的客观事实,使用不同的经验数据证实各自的理论或否证对方的理论。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看法有着实质的不同,尤其是涉及国际行为主体这个重要问题,所以,可以把两派简称为国家中心(state-centric)理论和多元中心(multi-centric)理论,亦即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中惟一具有意义的单一性和理性行为体。在70年代国际事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各派指出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的许多“反常”现象,力图否定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相信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将会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新的主导理论。

但是,随着第三次辩论的发展,主流学派之间这种不可通约的现象逐渐淡化。转折点是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这部著作力图摒弃一切诠释性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

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古典现实主义中的哲学意义和社会内容被以非科学为理由排除在理论体系之外,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被表述为类似经济学中市场和个人构成的系统,或者说类似物理学中场和粒子的系统。为了发展这个系统,华尔兹必须把国家定义为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这样国家才可能成为可以类比的“相似”的单位。他也必须把国际体系定义为具有单一无政府逻辑的自助体系,这样才可能使相同的体系单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从事有规律的行动。¹⁴结果是现实主义从一种描述国际关系实质性内涵的理论转化为一种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其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华尔兹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80年代的重要现实主义著作,如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布伊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的《战争的困境》等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特征。

华尔兹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并不在于他对现实主义世界观的调整,而是他把现实主义发展为具有高度科学特征的国际政治理论。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自由主义各个理论流派成为在学理、在理论体系发展方面很难与其竞争的理论。但是,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得第三次论战中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对手新自由制度主义得以产生。

新自由制度主义之所以在诸自由主义流派之中成为影响最大、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学理上抗衡的学派,主要是它同样呈现出高度的科学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果断的取舍,重新定义核心概念和基本研究议程。基欧汉1984年的《霸权之后》所作的实质性努力的意义正在于此。他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收入了他80年代的主要论文,更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学术思想。¹⁵首先,基欧汉放弃了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存》中的基本假定,转而承认国家的理性和单一性特征,这就从根本上接受了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他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接受了华尔兹对无政府逻辑的定义。再次,他也致力于发展体系理论,力图发现最简约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为此,他把国际制度定义为国际体系进程的基本特征,把国家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这样一来,基欧汉的理论也成为高度简约的、呈现高度科学性的系统理论,其基本变量也是两个,即国际制度和国家行

为；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

历史久远、纷繁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华尔兹和基欧汉的整合之下，成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流派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者之间的论争也构成了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国际关系学理论争论的重心。但是，在两派理论都向着高度科学性努力的同时，它们也在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理论框架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上面。新现实主义一直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并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公司的方式，把国家定义为利己的、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国家的利益和身份完全是内部因素决定的，与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没有关系。基欧汉在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也从 1977 年肯定多元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后退，承认关于国家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定，把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假定为给定因素，是独立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至此，两派的基本理论假定从根本上统一到理性主义上面，研究方法也都统一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上面。

第二，世界观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新现实主义的最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状态，主要以军事力量定义的国家权力和以物质收益为主的国家利益也反映出单纯物质主义的浓厚色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但其作用取决于制度能够提供的物质回报，物质性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观念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观念能够成为一个与权力和利益并列的自变量，具有独立的因果作用。然而，观念与权力和利益之间虽然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列的关系，但观念的作用也只能是弥补物质权力和利益解释能力的不足。¹⁶ 所以，在物质主义世界观方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趋同。

第三，认识论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诠释性理论。基欧汉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赞成新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推理原则。……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

不满足于对文本的诠释:两派学者都认为存在国际政治的客观事实,虽然这样的事实总是不能完全得以揭示,但部分的解释是可能的。”¹⁷一切对国际政治社会内容的考虑和对国际政治诠释性的研究都被视为没有明确研究议程和可证伪假设的非科学解释。¹⁸

第四,研究方法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起点都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又派生出三个基本假定。首先,无政府状态是给定因素,“客观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是凌驾于体系中行为体之上的无形之手。其次,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恒久的基本特征,所以,国际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必然要以无政府状态为研究起点。华尔兹讨论均势和两极结构对无政府状态负面影响的制衡作用,基欧汉探讨国际制度对无政府状态负面影响的削弱作用,两种研究议程都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为切入点。再次,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秩序只有一种逻辑,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逻辑,亦即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自助体系的逻辑。¹⁹基欧汉在研究国际制度的一系列论著中,无政府状态的这一逻辑都是被作为理论假定和给定因素处理的,他从来没有对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性质提出质疑。所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种体系理论在国际体系基本特征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

另外两派的研究层次也是相同的。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在多种层次上展开,如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个人层次等。华尔兹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理论必须是体系理论,一切以单位为分析层次的理论都是还原主义理论。²⁰基欧汉在其1989的论文集中也明确指出:“新自由制度主义像新现实主义一样,力图通过探讨权力分散的国际体系的性质来解释[国家]有规律的行为。”²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坚持体系理论的研究方向,认为诸如国家和个人层次上的研究无法构成国际政治理论。虽然两派所强调的侧面不尽相同,但研究层次都是国际体系,都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可以称为国际政治理论。

由于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也相互吸引和相互靠拢。根据鲍德温的阐述,到90年代,两派的研究议程和主要分歧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使国家在整体上趋于不合作,相对收益是国家考虑的主要问

题,国际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导致根本的国家间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承认无政府逻辑和体系结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国家可以以绝对收益为基本考虑,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家的实质性合作。这样一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就集中到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甚至仅仅就技术性问题相互论证。两派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和同样的方法测试两种理论提出的假设,如国际规制的作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霸权治下的体系稳定等等。至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不像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那样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共同的理性主义学理基底、科学主义研究原则、无政府逻辑的假定以及合作进化和制度作用等研究议题使这两个主流理论学派不仅成为可以通约的理论,而且产生了所谓的新一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²²新自由主义已经从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转变为合作者。这种新新趋同的结果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对现有理论的质疑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和虚化。因此,国际关系辩论的分界线自然而然地开始转移。

非主流学派的挑战:批判与反思

随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步步趋同,被统称为反思主义的各非主流派向主流派的挑战仍在继续。非主流理论和主流理论的争论涉及认识论问题,但核心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争论,因为非主流的挑战仍然是指向主流理论的核心假定,如客观性和主观性、客体和主体的关系等问题。所以,这一论战的关键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并且,反思主义具有深刻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这就使辩论的内容更具火药味。

反思主义包含了许多派别,这些派别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其反思对象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承认理性主义的基础,强调理论的诠释性、行为体和结构的互构性、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这样,国际关系就不能从理性主义视镜中观察,国际关系现象也就不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反思主义

在以下三个方面和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²³

首先,理性主义理论属于因果性解释理论(Causal Theory)。因果性理论把世界和行为体视为外生于理论的客观存在,是不以理论导向为转移的。理论的目的是揭示人类行为和客观世界的规律,亦即解释变量之间的有规律因果关系。据此,对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研究和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从本质上是一样的。²⁴反思主义则不同,反思主义各派基本上都强调建构作用。它们认为理论无法独立于它要解释的事物,我们的语言、概念、实践、理论都参与了对事物的构建。这也就是说,是理论界定了我们认为是客观世界的东西。这样,我们使用的概念实际上会对客观世界产生建构作用。所以是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建构了这样的世界。

其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坚持认识论基础主义,认为所有关于真理的陈述都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我们能够以这个基础为准,以公正和客观程序对陈述加以验证,确定属真或属假。反思主义则基本上是反基础主义的。反思主义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基础,所以也就不存在公正和客观的验证程序。这样,关于真理陈述的属真或属假就无法判定。进而,由于每一种理论都自行对客观事实作出定义并根据这种定义进行解释,所以在不同理论的竞争中也无法公正地判定孰是孰非。

另外,主流理论信奉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西方知识界对知识积累的重要观点,认为科学的内涵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客观事实和价值观念可以分离,客观事实独立于任何理论;社会界和自然界一样存在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被发现的。据此,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对照客观事实对理论加以验证。反思主义否认这些实证主义假定的合理性。对社会界的研究无法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无法分离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甚至无法确定客观事实本身,所以实证主义的这些基本假定无法应用于社会界。

反思理论的重要派别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等人把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Habermas)的思想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对主流理论代表的知识体系进行了批判。在基本的客观性问题上,批判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家是社会的一部分,生于社会,长于社会,所以社会科学家无法独立于他们的研究对

象。这是与自然科学家的根本不同之处。社会事实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充满价值观念的,所以关于社会的理论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理论。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使现有秩序合法化,而批判理论自身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主流知识体系的批判,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1981年考克斯发表了《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论文,矛头所向是新现实主义,指出新现实主义理性实际上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对外政策观,所以本身就是价值观念的体现。进而,新现实主义把世界描述成独立存在的事实,而将使这个世界得以存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作为给定因素不加质疑,其目的就是使现有的世界秩序得以物化和合法化。主流理论是解决问题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力图解决现有社会和权力关系面临的问题,以保证这些关系的持续存在和正常运转。因此,“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²⁵考克斯强调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主流理论所谓的像国家这样的给定因素实际上是历史和社会力量所建构的。

反思理论的另一重要派别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具有高度的反基础主义特征,对任何元叙述(meta-narratives)发起挑战。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R. B. J. 沃克(R. B. J. Walker)认为像新现实主义这类宣称可以直接探求真理的理论自封为理性的代表,为自己编织了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对其他各种话语进行压抑。但是实际上,号称真理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需要对其解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受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论述影响颇深,他们反对知识中立说,不接受知识不受权力左右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权力造就了知识。所有权力要求知识,所有知识依赖于并加强现存的权力关系。他们质疑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提出的所谓真理,认为这些理论的概念和知识假定实际上是依附于特定的权力关系的。权力和真理在历史中平行发展、互相加强,关于社会界的陈述只有在具体话语中才是“真理”。权力关系使某些话语和在这些话语中产生的“真理”具有主导性质。据此,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像新现实主义这类致力于建立元陈述的理论体系,因为这样的理论意味着确定知识真伪的条件不是话语的结果,因之也就不是权力的产物了。另外,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根据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理论,提倡对国际关系文本进行分解。阿什利认为文